

民族国家形成时期 英国殖民扩张特点探析

姜守明

内容提要 民族国家形成之际,也正是英国人大力推进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之时。新君主制的巩固、英帝国的萌芽和海外殖民贸易扩张是民族国家形成时期几个重要的互动因素。新君主制和民族国家日益成为新兴市民阶级追求其经济利益的政治保障,市民阶级则构成新君主制和民族国家赖以存在与发展的阶级基础。除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外,传播上帝的福音,对金银财富的追逐,以及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新君主制的建立,也构成英国海外殖民扩张的动因。本文拟选取“民族国家形成时期”这个全新视角,考察现代“民族国家”和“帝国”之间的关系,探讨英帝国形成的内在机制,揭示英国海外殖民贸易扩张的根本特点。

关键词 殖民扩张 民族国家 英帝国

在民族国家形成时期(15—16世纪),英国对海外殖民贸易扩张问题是英国史与英帝国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英国原本是一个弹丸小国,位于欧洲二流国家的行列,但是后来却令人不可思议地发展成为一个首屈一指的世界贸易殖民帝国。现有的研究成果或多或少地回避了这样一些问题,诸如英国殖民扩张的动力和特点是什么,英国人何以晚到17世纪上半叶才在北美新大陆建立起永久性海外殖民地?英帝国发轫于何时,是什么样的内在机制在帝国形成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为什么英国能一跃而为无与伦比的泱泱大帝国?为什么“民族国家”和“帝国”这两个看似矛盾的东西能够在英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实现统一?

不论英国史学界还是中国英国史研究专家,对英国海外殖民扩张问题的重视程度都很欠缺。对于上述诸多疑问,学者们要么从英帝国前期的概要过程入手,要么从英帝国崛起后的发展方面把握,很少把关注的重点放在殖民扩张与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上,忽视了史学研究中的历史主义^①。尤其在讨论早期英帝国史问题时,有的学者停留在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政府决策的一般描述上;有的文章用感情代替理性,分析问题时不免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还有的著述回避了殖民扩张给被征服、被殖民地区所造成的消极后果^②。由于受原始资料等研

① D. B. 奎因编:《英国与美洲的发现》(D. B. Quinn, ed., *England and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1481—1620*),伦敦1974年版。

② 罗杰·洛克耶:《都铎和斯图亚特的英国》(Roger Lockyer, *Tudor and Stuart Britain 1471—1714*),朗曼出版公司1984年版。

究条件的限制,尽管国内发表了不少相近或相关的著述^①,但它们几乎没有考察民族国家形成时期英国民族意识与帝国思想之间、民族国家形成与帝国萌芽之间的联系,更没有就英国殖民扩张的动因、特征等基本问题作出系统而全面的评价。本文拟选取“民族国家形成时期”这个视角,探析英国海外殖民扩张活动中的经济因素、政治动机、民族意识,以及与其他殖民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试图揭示出英国海外殖民贸易扩张的基本特点。

民族国家形成时期英国殖民扩张的动因

民族国家形成时期(近代早期),英国的商品货币关系发展较快,特别是东南部地区的呢绒制造业等工业生产同欧洲贸易市场已经建立了密切联系,客观上促进了殖民探险活动的开展。英国人地理发现范围扩大,殖民扩张势头强劲,似乎对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所垄断的世界霸权构成挑战之势。那么,除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之外,还有些什么力量推动着英国人跨出国门、积极参与海外殖民扩张的呢?

1. 新君主制的推动

新君主制是英国人跨出欧洲,走向海外,从事殖民扩张的政治保障。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已成为专制君主推行其政治、经济政策的指导性原则,这个原则奠定了英国从弱小走向强大的基础。民族国家形成时期的新君主制是相对于基督教普世主义原则下的封建等级君主制而言的。中世纪欧洲人认同的是封建领主,各世俗王权多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国王只是众多领主中最大的一个而已,其权力一般不会超出有限的王室领地范围。然而,在新君主制下,王权是至高无上的,它是近代的民族和国家,而不是以封建的采邑与庄园为基础,所以国王就成为民族的代表和民族国家的象征。

英国的新君主制萌芽于约克王朝,发展、巩固于都铎王朝。随着封建关系的松弛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加强,财政上本来就难以自给的国王,此时开始对新兴工商业和海外贸易产生较强的依赖性。约克王朝爱德华四世(1461—1485年在位)统治初期,积极实施重商主义政策,寻求个人的商业投机,借以巩固新生的王权,从而使他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个著名的“商人国王”。他不仅本人对商业活动颇感兴趣,而且非常关注本国的贸易交往活动,如1474年向布里斯托尔城所有建造新船的人提供奖赏,1476年奖励了一位自费修造一艘“乔治·科布罕”号船的伦敦布商。爱德华还请求罗马教皇赋予英国人在北非从事贸易活动的权利,默许英国商人侵入北非沿岸从事贸易活动。对于英国商人直接进行海外地理探险的航行活动,他也给予必要的鼓励和支持,如1480年授予托马斯·克罗夫特和三个布里斯托尔人特许状,赋予他们“到任何地方”从事三年贸易活动的权利^②。

亨利七世在混战中登上英国王位,认为英国在对外关系上主要不是角逐欧洲霸权,而是谋

① 主要有郭家宏:《英国殖民地体制的特征及其瓦解原因》,《史学月刊》2000年第6期;王助民等著:《近现代西方殖民主义史(1415—1990年)》,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陈曦文:《都铎前期的对外贸易和政府的重商政策》和《伊丽莎白时代的商业扩张》;威国淦、陈曦文主编:《撷英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高作钢:《英国都铎王朝海上政策初探》;吴于廑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等。

② 查尔斯·罗斯:《爱德四世传》(Charles Ross, *Edward IV*),伦敦1983年版,第353—354页。

求扩大海外的实际利益,英国人的未来“必须依赖于贸易和海权”^①。他一方面维护都铎王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追随着爱德华四世的政治、经济政策,为整个都铎王朝确定了推进工商业、拓展海外探险事业的重商主义的发展方向。所以,他推动实施具有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两重性质的《航海法案》,为英国商人顺利进入海外市场创造条件。同时,他还采取积极政策,增加对尼德兰和德国的呢布销售,逐步改变英国商人在对外交往中的不利处境,以提高英国人参与海外贸易与殖民竞争的能力。

新君主制的巩固与殖民活动的加强是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都铎新君主制是英国的一种新型国家体制,它把专制王权的功能与民族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从而与中世纪旧的“等级君主制”区别开来。这种新君主制具有两个最基本特征,一方面用“主权在王”的民族国家概念代替“主权在神”的基督教信条,用神权君主代替神化上帝。为了寻求新君主制的合法性,都铎君主依靠民族国家的力量,把民族主义原则作为新生王权合法性的基础。民族统一的愿望与君主权欲的野心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使专制国王超然于国家之上。另一方面,英国在摆脱封建内讧困扰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专制王权为代表的民族国家。

2. 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国家发展

英国人在海外殖民扩张中遇到很多障碍,主要是来自于汉萨同盟^②的排挤和西班牙、葡萄牙的遏制,以及罗马教皇的反对。虽然葡、西两国已同意英国进入民族国家状态,它们却从本国利益出发,竭力垄断海外殖民霸权,这完全是由民族国家的利己性和排他性特征所决定的。为了求生存、求发展,英国决不甘心屈居二流国家的地位。亨利七世以灵活的外交手段,迅速取得欧洲大国的承认;亨利八世采取一切办法,试图打破凌驾于英王之上的各种外来势力;爱德华六世和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英国人追求的也是独立主权和民族国家利益。

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英国人反对外来势力的斗争日益具有民族的性质和规模。这种强烈的民族倾向,在英国宗教改革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主要体现于1533年议会颁布的“禁止向罗马教廷上诉法案”之中。该法案强调英王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英国教会是一个独立于罗马教廷的民族教会,它们决不隶属于任何外来的权威与特权:“英王国就是一个帝国,它已被全世界所承认。英国由一个至高无上的国王来统治,他拥有相应的至高无上的尊严和王产。”^③更有重要意义的是,1534年的《至尊法案》从法律上肯定英王在英王国领土范围内享有至高无上的世俗统治权和宗教管辖权。当英国人第一次把自己的王国称为“帝国”时,“帝国”一词主要不是涉及跨越大西洋、建立海外殖民地的问题,它的特定含义是指英王国就是一个摆脱了教皇控制的独立主权国家;就是一个像西班牙、葡萄牙一样享有均等

① J. A. 威廉森:《都铎时代》(J. A. Williamson, *The Tudor Age*),朗曼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36页。

② 汉萨同盟是以北德城市为基础、联合其他北欧城市建立起来的、相对松散的中世纪城市同盟。近代民族国家形成时期,它已经失去先前的政治实体优势,既无强有力的王权支持,又无民族国家作后盾,后来在与英国人的斗争中最终败下阵来。

③ 《王国法令集》(Statutes of the Realm)第3卷,转自H.吉和W.哈迪:《关于英国教会史的文献》(H. Gee & W. Hardy,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Church*),伦敦1914年版,第187页。J.R.泰勒:《都铎宪法文献:历史评注》(J. R. Tanner, *Tudor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A. D. 1485—1603, with a Historical Commentary*),剑桥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40页。

权利的民族国家。所以,当英国人主张他们有权到伊比利亚势力尚未渗透的地区从事商业贸易和殖民探险活动时,尽管其有着丑恶的动机,但在某些方面,都表现为,是向其他民族国家以及教皇权威提出的挑战,都是为了维护航海和贸易自由的民族利益。

“民族国家”与“帝国”这两个看似矛盾的东西,为什么能在英国人的思想中得以统一呢?答案不在历史之外,而在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之中。长期以来,罗马教皇和哈布斯堡王朝等外部强权始终威胁着英国的独立和主权。一位英国史学者指出:“我们的帝国创立者最先提出了向西拓展的思想。我们不是建立帝国野心的开拓者,哥伦布在寻找通往印度的海道中打开了新大陆之门。西班牙完全以毫无怜悯的残酷方式掠夺了这块新大陆,他们当时是我们民族的敌人。”^①英帝国史专家劳埃德教授认为,都铎时代政治家们提出的“单独的英国就是一个帝国”的主张,与其说表明了英国人对外殖民扩张的思想倾向,毋宁说表达了英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民族国家)的强烈愿望^②。我们不同意他为英国人殖民扩张的辩护,但也认为,民族意识觉醒不但造就了一个以新君主制为核心的民族国家,而且将参与推动造就一个帝国。因此,16世纪英国人争取民族国家独立发展的过程,也部分表现为他们追求拓展海外冒险事业,建立西班牙式和葡萄牙式的殖民帝国的所谓平等权利的过程。

3. 追求金银财富的欲望

殖民扩张运动源于古代世界,或是出于探宝寻物的目的,或是为国内人口压力所迫,或是想夺取其他民族的财富。大陆欧洲旅行家早在13世纪就已到达了亚洲,意大利航海家还发现了大西洋中的一些岛屿。近代早期,西方殖民扩张开始于刚刚摆脱阿拉伯人统治的伊比利亚半岛。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奔向海外冒险的最初动机,几乎完全是为了探寻新航路,试图从海路到达遥远的中国,继而发展与东方的贸易关系,获取欧洲人迫切需要的香料、宝石和贵金属;或者兼有寻找传说中“长老普雷斯特·约翰王国”、“极乐群岛”、“幸福群岛”、“七座城岛”和“黄金国”的目的^③。

当伊比利亚人从东西印度带回大量的金银财富时,英国人对“黄金国”的传说已经深信不移。于是,到东方和新大陆寻找财富,就成为英国殖民探险活动的重要目的之一。16世纪70年代,马丁·弗罗比歇爵士从北美巴芬岛带回一种黑色而又闪闪发光的石头,立刻在国内掀起一股黄金热。伦敦还成立了一个中国股份公司,准备开发弗罗比歇发现的“金矿”。伊丽莎白女王赐予他“再次发现的特别是在中国发现的一切海洋、湖泊、陆地、海岛、国家和地区的总司令”的头衔^④。虽然没有一个人能从弗罗比歇爵士带回的矿石中发现一粒金子,他也没有真的发现通往中国的新航路。但是,许多冒险家们依然像着了魔似的,在黄金欲的驱使下,踏上了殖民探险之路。女王的宠臣沃尔特·雷利爵士就曾梦想着黄金国,梦想着印度数不尽的财富、墨西哥和秘鲁的大量珍宝,并从女王手中接过特许状,前往西班牙领地佛罗里达以北的“弗吉尼亚”^⑤寻找黄金产地,把其所发现的地区命名为“弗吉尼亚”。随着一股股黄金热的到来,英

① 弗兰克·福克斯爵士:《英帝国》(Sir Frank Fox, *The British Empire*),伦敦1929年版,第30页。

② T. O. 劳埃德:《英帝国》(T. O. Lloyd, *The British Empire 1558—1983*),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

③ 约·彼·马吉多维奇著:《世界探险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65—67、307—308页。

④ 约·彼·马吉多维奇著:《世界探险史》,第473页。

⑤ Virginia一词源于拉丁文Virgo,意为处女地,雷利爵士以此纪念终身未嫁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国殖民者考虑建立海外殖民地,并在殖民地上生产在国内无法生产的东西,从而摆脱对大陆欧洲商人的经济依赖。

4. 传播上帝的福音

历史上重大的转折往往伴随着宗教的变迁。在本质上是掠夺殖民地财富的西方殖民扩张过程中,宗教因素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的早期殖民探险者不免带着几分虔诚,试图把上帝福音和宗教理想传播到新的土地上。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当世俗精神终于把商业扩张和宗教热情结合在一起时,欧洲人的殖民冒险活动被罩上了神圣的光环,英国殖民扩张活动也不例外。虽然不能认为宗教是促使他们踏上殖民冒险之路的最主要动力,但他们仍然给追求物质利益的殖民扩张行动涂上了一层宗教色彩。著名殖民扩张鼓动家哈克卢伊特在其《向西殖民论》一文中详尽列举了在美洲建立殖民地的种种好处,诸如有利于工业生产的原料供应和商品销售,促进国内工商业发展;有利于扩张他们的宗教和传播上帝福音;有利于反对西班牙殖民垄断权,增强英国的综合国力;有利于转移国内的过剩人口,为“大量无所事事的人”提供就业机会;有利于推动发现到达亚洲的新航路,寻求新的贸易机会。虔诚的传教士哈克卢伊特在强调殖民扩张重要性时,没有忘记重视对未开化地区移民、扩大传播福音、移植宗教及其信徒的问题。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由思想和精神的自由相伴随,它们已经成为英国人反对旧的世界秩序和普世主义教会权威的旗帜。特别是宗教改革,给英国带来了社会震荡,结果导致不服从国教的新教徒、天主教徒及清教徒纷纷移民国外,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海外殖民冒险活动的开展。

英国殖民扩张改变着地缘政治

英国人在民族国家形成时期大力推进海外贸易殖民扩张,这决不是一种历史的巧合,除了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的强烈要求外,也是民族国家的排他性等内在属性推动的结果。

1494年意大利著名商人冒险家约翰·卡伯特举家来到英国,请求英王允许他以英国人的名义向西航行,到“大汗的国度”(中国)去探险^①。地理大发现时期,“探险者虽然绝大多数是意大利航海冒险家,但他们的资助者都是新兴的民族君主国,而不是他们的家乡、微不足道的城邦,这一点绝非偶然”^②。由于没有强大的王权和民族作后盾,意大利人只能以个体方式,把优秀的航海技术服务于其他民族国家。1497年5月,卡伯特以都铎王权和英国民族国家为后盾,率领探险船队朝西北方航行。他以英国人名义发现、占领了北美的纽芬兰,还插上标有英王亨利七世、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威尼斯圣马可徽章的旗帜。后来,亨利七世授予他海军上将称号,加赐赏金10镑,年金20镑。卡伯特的北美之行,给英国人带来了积极进取的新思想和关于航行发现的新知识,为起步不久的英国海外探险活动注入了刺激因素,标志着英国人作为一个海洋民族参与海外殖民贸易竞争的新时代的到来。

英国早期对外贸易多是以规约公司或辛迪加等私人团体形式进行的,商人们冒着被西班牙

① 莱斯利·M. 史密斯编:《英国的创造》(Lesley M. Smith, ed., *The Making of Britain: The Middle Ages*),伦敦1985年版,第179页。

② 斯塔夫里亚诺斯著:《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467页。

牙、葡萄牙和穆斯林海盗攻击的危险,航行到遥远的、未被其他列强殖民的地区从事探险活动。英国私人冒险活动活跃,在促进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发挥了开拓性作用,这是葡萄牙、西班牙人无法相比的。英国商人为了避开危险而走向联合,他们把个人行为变成集体行动。规约公司是受共同规章约束的商人组织,较大的规约公司有羊毛出口贸易商公司、商人冒险家公司和东地公司。商人贸易组织的动力来自于对商业利润的追求,他们通过参与海外贸易竞争,加强了民族国家的地位。16世纪中期以后,推动海外贸易发展的私人组织,是经过都铎政府特许成立的商人股份贸易公司,其中主要有东地公司、土耳其公司、威尼斯公司、几内亚公司、利凡特公司和东印度公司。它们向北开辟东北航线,发展与俄罗斯、波斯等东方国家的贸易往来;向东恢复同东地中海地区的贸易关系,开始对远东地区的殖民探险活动;向南同非洲大西洋沿岸地区建立商业贸易关系。这些民间性商业冒险活动,为英国海外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民族国家形成时期,英国人在恢复个人主义传统和海盗精神的基础上,不懈地追求民族国家利益,民间自发的海盗行为就成为他们寻求这种利益的重要补充手段。西班牙人依靠武力建立起强大的海上霸权,英国人、法国人、尼德兰人也随之走上海上劫掠的道路。虽然英国人暂时无法打破垄断地位,他们要求摆脱外国人束缚的呼声却持续高涨。为了摆脱来自于天主教列强的威胁,伊丽莎白女王借助于商人追求财富的冒险精神和高涨的民族情绪,公开地或不公开地支持本国冒险家从事各种合法的和非法的殖民扩张活动。在英国势力尚不足以从根本上摧毁外国人的海上霸权时,海盗冒险家在都铎政府的默许、纵容甚至支持下,“闯入”为葡萄牙和西班牙所垄断的势力范围,公然挑战伊比利亚人的殖民垄断权。

德文郡普利茅斯的霍金斯家族是西部地区重要的海盗势力。1560—1570年代,约翰·霍金斯不顾西班牙政府禁令,先后三次从事英国、非洲和西印度间的贩奴“三角贸易”。霍金斯的海盗活动由于受到伊丽莎白的支持,已经超出纯粹的私人冒险范围,具有官方认可的性质^①,开创了英国史上的黑人奴隶贸易。另一位重要的海盗首领德雷克,他的冒险行动不但获得西部民间团体的支持,也得到了女王本人及其重要廷臣的支持。女王鼓励说:“德雷克,这样我该报西班牙国王多次侮辱之仇了!”1577—1580年,德雷克率领三艘海盗船和两艘补给船,踏上了环球航行的冒险征途。《德雷克传》的作者评论说:“这好像完全是一件国家大事,尽管能够找到借口,正如霍金斯当初到西印度的远征一样”^②。他抢劫了西班牙船只和西属殖民地城市,带回了大约60多万英镑的财富^③。就在1581年新年那一天,女王头上戴着德雷克赠送的王冠,上面镶嵌着5颗劫来的光彩夺目的绿宝石。她还亲临德特福码头,登上“金鹿”号旗舰,把骑士称号授予德雷克,以此表明:殖民扩张不再仅仅是商人冒险家和航行方案设计者个人的事情,已经变成英国新君主制和民族国家发展的要求。毫无疑问,德雷克的环球航行具有鲜明的官方性质,是海盗活动走向合法化的开始。海盗活动进一步激化了英西之间的民族矛盾,双方的正面冲突已经不可避免。1588年6—7月间,英国人分兵把守南部沿海从普利茅斯至多佛一线

① A. L. 罗斯:《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扩张》(A. L. Rowse, *The Expansion of Elizabethan England*), 伦敦 1955 年版, 第 174 页。

② J. A. 威廉森:《德雷克传》(J. A. Williamson, *The Age of Drake*), 转引自 A. L. 罗斯:《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扩张》, 第 182 页。

③ J. 霍兰·罗期, A. P. 牛顿和 E. A. 贝尼安斯:《剑桥英帝国史》(J. Holland Rose, A. P. Newton, and E. A. Benian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Empire*) 第 1 卷,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29 年版, 第 62—63 页。

各港口,准备迎战随时入侵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出人意料的是,他们以弱胜强,成功地抵御了自罗马时代以来最强大的军事进攻,打破了西班牙人不可战胜的神话。这“是跨越海洋的商业战争中第一次重大的海战”^①。它摧毁了西班牙海上霸权,实现了欧洲中心从传统的地中海世界向广阔的大西洋海域的转移,这一后果必将改变西欧各国地缘政治,在英国殖民扩张史上具有重大影响。正是在挑战西班牙殖民贸易垄断权的斗争中,英国人逐步走上世界强国之路。

当然,英国与葡萄牙、西班牙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新老殖民主义之间斗争的反映。虽然英国人对外殖民扩张的背景之一是争取所谓的独立发展权和民族平等权,并向欧洲传统的旧秩序提出挑战,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英国人在走上地理探险和殖民扩张之路的过程中,是以牺牲美洲印第安人,以及东方民族的利益为代价的。实际上,对于被殖民和被奴役的各地区、各民族而言,不论是葡萄牙人还是西班牙人,也不论是荷兰人、法国人还是英国人,他们的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都是被殖民地区和被奴役民族所无法接受的。新老殖民主义者从来都不是作为和平使者来到东方的,而是作为征服者来寻找和掠夺财富的。“从征服一开始,殖民主义者即采取了极端野蛮的抢劫方式,攫取了在他们看来一切有足够价值的东西。”^② 他们所从事的非洲黑人奴隶贸易,和他们不惜以任何手段征服、奴役,甚至杀戮美洲的土著居民一样^③,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行,也是近代早期西方文明史的耻辱。

民族国家形成时期英国殖民扩张的特点

近代早期的欧洲历史,就是一部西方民族国家之间相互冲突、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的历史。在考察英国殖民扩张的特点时,必须结合民族国家形成时期具体的历史条件,充分认识英国殖民扩张的独特性及其对英帝国萌芽的推动作用。

1. 殖民扩张的社会动力主要来自于商人和中小贵族

从15世纪后半期到17世纪初,英国的殖民扩张总体上处于海外探险阶段和尝试建立殖民地阶段。最初的海上冒险者主要是那些为了商业利润铤而走险的商人冒险家,还有包括中小贵族在内的中等阶层,他们共同构成殖民扩张的基本社会阶层。商人为了积累资本而生存,追逐利润是商人资本家的本质特征。他们敢于冒一切风险,寻找到达富饶东方的财富之路,开辟新的贸易活动场所。16世纪50年代,伦敦商人组织起来向东北方探险,开拓了俄罗斯和波斯等地的贸易就是例证。私人特许商业公司、私人投资、私人冒险,一句话,不依赖政府资助是民族国家形成时期英国海外殖民贸易扩张的基本特征。

英国殖民贸易扩张的社会动力,首先来源于西部的布里斯托尔、普利茅斯、赫里福德、南安普顿和东部伦敦的商人与商人集团,来自于普利茅斯的霍金斯家族、索恩家族、巴洛家族、弗兰普顿家族、帕里家族、安德鲁·贾德爵士和威廉·切斯特,以及莱昂内尔·达克特爵士、托马斯·斯迈思爵士这样的大实业家,他们或者直接参加探险活动,或者为殖民贸易活动提供资金。海外探险和殖民事业激发起每个阶层人们的海外幻想,他们以不同方式表现出对海上活动的热情。

① 蒋孟引主编:《英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24页。

② 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上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1页。

③ 斯·尤·阿勃拉莫娃:《非洲:四百年的奴隶贸易》,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8页。

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贵族阶层虽然高高在上,也不能不感受到商品货币关系的影响,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就开始关注自己的经济利益。虽然许多人很少关心前途未卜的海外定居问题,他们却积极资助和投资冒险事业,希望能为他们带来丰厚的利润回报。像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沃尔特·雷利爵士和乔治·卡尔弗特那样热衷于移民与拓展殖民地的贵族毕竟人数很少,像巴尔的摩勋爵那样为了留在殖民地而移民的贵族更是鲜见^①。

都铎新君主制“给新的中产阶级创造了机会……小土地所有者,他们后来被称为乡绅,在乡村的大土地所有者和城市商人之间搭起一座社会之桥,并和他们两者保持着密切关系。……正是他们将其个人勇气和冒险精神同外国统治对立了起来”^②。乡绅的成份十分复杂,大致应包括骑士、缙绅、有绅士称谓的约曼农、富有的农场主,甚至还可包括购置土地的商人等等。以乡绅为代表的中等阶层,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农业资产阶级,他们积极参与圈地运动,投资工商业,热衷于从事海外冒险事业。由于乡绅“跻身于伦敦和宫廷上流社会,这些人在价值观念上迥然不同于在乡间过‘平淡生活’的人”^③。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在海外殖民扩张活动中扮演着积极参与者的角色。

乡绅中的约曼农是小农场主,英国学者认为约曼农素以勤劳和独立精神而著称,他们朴素大方而又单纯坦率;良好的邻里关系;尊敬上司而不畏惧他们。约曼农他们是人口稀少、土地资源丰富的北美大陆的重要拓荒者。约曼农是移植到新大陆的英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在美洲殖民地的开拓和维持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英国广大农民也较早摆脱了封建农奴制束缚,他们所享有的自由是一种后果莫测的自由,从而为他们不顾一切危险移居新世界作好了思想准备,并为北美殖民地的未来开发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2. 英国海外殖民扩张的私人性和民间性

英帝国史起源于私人性的海上冒险事业,私人殖民冒险活动为英国通向帝国之路奠定了基础,这是英国殖民扩张史同其他大国殖民史的一个重大区别。都铎早期,如果说民间性的殖民冒险同政府之间有什么联系的话,那么,皇室签发给私人的特许状就是这种联系的惟一纽带。特许状上的许诺对于私人探险者来说,具有一种特别的诱惑性,它们足以让那些做黄金梦的冒险者们不顾一切地奔向海外,并让那些怀有各种政治抱负与宗教理想的人跨出国门。发出特许状对于英王而言并非难事,或许还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这既可为人不敷出的王室增加财政收入,也可以为专制王权统治下的国家带来荣耀。直到斯图亚特王朝之前,海外殖民扩张依然表现出这种强烈的私人性和民间性特征。

殖民扩张活动是一种必须付出代价的冒险事业,只有在强大王权的保护下,并获得源源不断的经济资助才能取得成功。随着都铎君主制的加强和国内外环境的改变,英国殖民扩张的私人性和民间性特征也在发生变化。最初从事海外活动的人,除了获得英王授予的一纸特许状外,几乎得不到任何来自王室和其他上层人士的赞助。不论早期私人殖民探险活动组织得多么完善,参与者多么勇敢,多么富有智慧,都注定了失败的命运。虽然王室和廷臣们多成为

① 约瑟夫·E. 伊利克编:《美洲与英国》(Joseph E. Illick, ed., *America and England 1558—1776*),纽约1970年版,第154—155页。

② 洛德·埃尔顿:《帝国共同体》(Lord Elton, *Imperial Commonwealth*),牛津1946年版,第14页。

③ 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页。

私人冒险事业的合伙人,他们也只是以个人的身份,而非以政府的名义介入其中^①。英国海外殖民扩张不自觉地因循了这样的历史轨迹,就是开始于以私人为主的民间冒险行为,发展为民间性与官方性并存的冒险事业,再发展为政府操纵下的民族殖民事业。由于“英国国王财力短绌,不能资助殖民地;个人事业则热衷于快活冒险,以及劫掠西班牙领地和掳获西班牙船只所得到的稳妥利益。这类活动增强了英国的信心,也增加了他们对海洋的认识,所以最终还是对帝国有所裨益”^②。伊丽莎白女王后期,王室资助下的霍金斯、德雷克的海盗活动已经具有浓重的官方色彩。尽管女王在公开场合下通常谴责这种行为,她只是在表面上维护着英西之间尚未公开破裂的所谓“友好”关系。但从1588年击溃“无敌舰队”之日起,英国海外殖民贸易扩张加快了从私人性向官方性的根本转变,尽管詹姆士一世继位后这种转变过程一度又放慢了速度。

英国海外殖民扩张活动的私人性、民间性特征决定了英国第一帝国形成中国家行为的相对软弱性、滞后性。从都铎王朝到斯图亚特王朝,政府根本无钱承担或支持殖民探险或建立殖民地所必需的费用,只好采取放任自流态度,让殖民者自力更生、自生自灭。最初的永久性殖民地是由私人性商业冒险公司所建立的,这种皇家特许商业贸易公司却是英国进行殖民扩张的工具。只有当国家的政权力量与私人的民间力量密切结合时,才能真正形成一股向外冲击的强大合力,推进对外殖民贸易扩张活动,殖民主义者才能在条件恶劣的北美大陆立足,建立起永久性的殖民地。不论在个人的动机背后隐藏着什么因素,国家都把支持和鼓励私人殖民探险视为一种手段,就是政府通过装备他们来与外来的敌人进行争夺世界财富与霸权的斗争。17世纪初,英国商人们还可以获得斯图亚特王朝授予的殖民贸易垄断权,殖民地建立后,特许商业公司实质上起到一种自治政府的作用。直到1624年“皇家殖民地”出现之时,民间性特许商业公司在殖民地运作过程中依然占居重要地位。

3. 民族国家时期殖民扩张过程的盲目性

殖民探险的私人性、民间性特征决定了英国殖民活动的盲目性、随意性。英国早期殖民扩张史构成英帝国的“前史”,这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从英帝国形成的角度来看,它根本不是英国政府认真思考和精心策划的结果^③,而是英国的商人冒险家在与其他民族国家的竞争中发展起来的。探险家和商人们的最初活动范围,仅限于不列颠群岛和爱尔兰岛附近,以及北海、波罗的海一带的海域;随后由近及远,逐渐扩大到地中海、大西洋西部海域和西班牙、葡萄牙所属的几个群岛区域,最后才转向北大西洋、北冰洋和美洲,乃至亚洲太平洋的广大地区发展。在殖民扩张早期,英国政府并没有制订过哪怕是一项长远计划,殖民探险活动的方向,从约翰·卡伯特为起点,就尽量避开伊比利亚人的势力范围,主要是集中在北大西洋水域,或者向西北方,或者向东北方。随着哥伦布的发现为世人所知,探索“新大陆”的强烈欲望日益支配着英国人参与争夺海外土地和财富的斗争。但是,他们的行动却是盲目的,因循了一个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渐进发展

① 姜守明:《从民族国家走向帝国之路》,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

②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威廉·爱德华·洛伊希腾堡:《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页。

③ 赫里福德·B. 乔治:《不列颠帝国的历史地理学》(Hereford B. George,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British Empire*),伦敦1919年版,第1页。

过程:从不自觉到自觉,从民间到政府,从冒险到殖民,从争取独立到对外扩张。但是,这个过程为资本主义生产积累了雄厚的资本,为英国第一帝国奠定了基础。

在殖民扩张过程中,英国人造就了自己的思想家、理论家。托马斯·莫尔爵士的出发点是把建立殖民地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方法,客观上却成为推动英国人开展殖民活动的最佳缘由之一。伊丽莎白女王继位后,英国人在极为险恶的外部生存环境下,在法国胡格诺教徒北美探险活动的影响下,逐渐选择了突破口,即破坏西班牙海上帝国的美洲生命线,追求自己的经济、政治利益。他们利用海上劫掠和私掠巡航,采取更为积极的海盗行动,挑战老牌殖民主义强权。随着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演进和海外殖民扩张活动的发展,英国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打败伊比利亚人的海上霸权,是英国民族未来的真正价值之所在,所以又明确地把美洲新大陆作为到达亚洲之路的踏脚石。长期的海上实践活动,造就了像霍金斯、德雷克、吉尔伯特、雷利等一大批经验丰富的私人冒险者,他们在谋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挑战了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殖民霸权,促进了旧殖民体系的瓦解,增强了英国人战胜西班牙帝国的自信心。此时,英国的殖民活动已经有了相对清晰的目标,这就是把建立北美殖民地作为实现富国强兵和谋求海外利益的重要手段,最终建立永久性海外殖民地,确立起自己的海上优势地位。

[本文作者姜守明,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 210097。]

(责任编辑:任灵兰)